

主编 冯抗胜

他们打下了一片江山，
他们留下了一片江山，
他们走了，
一个一个地走了，
走进了历史的年轮，
走进了我们的怀念、感戴和追求。

我們的父母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们的父母

顾 问 吴道英

主 编 冯抗胜

副主编 赵晓洋

张延风

文艳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父母 / 冯抗胜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225-349-0

I. 我… II. 冯… III. 革命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0900号

我们的父母

冯抗胜 主编

责任编辑: 罗 晨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段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一版 200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349-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尚健在的和已经故去的父母。

他们曾经是这个国家的职业革命者或职业军人。

他们为新中国的创建所做的一切,已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心田,成为后人精神的源泉和行为的楷模。

目 录

- 1 若有来生还要与你交谈 / 肖春临
- 5 父亲带我当红军 / 郑奇英
- 9 我的父亲郑位三 / 郑复康
- 20 好伯父郑位三 / 郑群忠
- 22 记我与姥爷郑位三的一次谈话 / 吴延平
- 27 父亲的一生 / 朱佳木
- 31 朱理治百年诞辰感怀 / 朱平壤
- 35 从富家小姐到革命战士 / 肖迅
- 45 涓涓细流 / 周小林
- 49 “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 楚晋 鲁齐
- 56 我所了解的父亲任质斌与何基沣的战友情 / 任全胜
- 62 记我公公任质斌的二三事 / 栗卫东
- 65 爸爸对我们的爱 / 任在晋
- 72 爸爸,我在用心对您说 / 任在齐
- 76 由一封信想起的 / 任在鲁
- 79 我的爷爷任质斌 / 任杰
- 82 他的眼睛 / 刘力军
- 84 我的妈妈蒲芸湘 / 刘力进
- 88 探寻父亲夏农苔的足迹 / 夏铮铮
- 94 回忆和爸爸在武汉的日子 / 融融 潜南
- 98 艰辛的历程 美丽的人生 / 顾红红
- 107 激情燃烧的岁月 / 方晋
- 111 为两弹一星隐姓埋名十三年 / 刘顺发
- 119 我心中的河 / 栗松北
- 129 父亲的人格魅力 / 栗卫东
- 133 两张老照片的回忆 / 任全胜

- 138 父亲留下一支歌 / 程沐雨
- 147 父亲与他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 程沐雨
- 154 爸爸妈妈,你们的风范永存 / 朱安妮
- 157 铁马冰河入梦来 / 冯抗胜
- 166 她曾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 冯抗胜
- 172 可敬可佩的肖叔叔 / 李紫阳
- 175 爸爸,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 童小晋
- 182 姥爷英魂长存 / 张彦媛
- 183 我心中的圣人 / 肖春临
- 189 回忆我的父亲李人林 / 李战平
- 191 精神 / 任志强
- 195 我和蔡斯烈伯伯的交往 / 任全胜
- 198 我的父亲余潜 / 余小明
- 202 我的母亲王瑞华 / 余小明
- 205 追寻父亲的足迹 / 顾大江 顾宁
- 213 父亲的故事 / 李舒亚 李苏静 李舒明
- 220 我的父亲杨显东 / 杨元惺
- 223 融化在血液里的誓言 / 栗建华
- 229 寻踪父亲 / 徐新民
- 238 我的父亲严家安 / 严力
- 241 缅怀父亲黄民伟 / 黄华明
- 245 父亲的脚板 / 何亚光
- 247 榜样 / 姜幼年
- 250 深切怀念父亲吴钊统 / 吴晋怀
- 254 坚定不移 忠贞不屈 / 吴季萍
- 257 怀念我们的父亲焦点 / 焦化平等
- 263 妈妈的选择 / 小丰
- 268 观玉树有思 / 毛毛
- 271 树叶对树根的探寻 / 张延凤
- 281 我的母亲刘醒亚 / 王娟娟
- 287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 王炼治

296	妈妈的点滴往事 / 王慧治
299	新四军中的小女兵 / 北江明
303	战斗情谊万古长青 / 周以朴
312	情深意切 / 张末生
316	馨香天际 / 张武毅
320	文人·战士 / 唐羽
342	在父母的指导下成长 / 李念亲
345	无尽的思念,无限的怀念 / 胡炜
350	父母亲指引我参加了新四军 / 霍震
354	当外贸部长的父亲 / 鲁林 等
359	永远的南化塘 / 赵晓泮
362	编后

若有来生还要与你交谈

——怀念李先念伯伯

◎肖春临

那些悲壮的故事，永远在我的心中回荡；
那些谆谆的教导，永远在我的耳边萦绕；
那些难忘的日子，永远在我的人生驻留；
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在我的脑海铭刻。

那个常被父母和长辈们念叨的名字，就是他们的老师长，我敬爱的李先念伯伯。他们的师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们的师长说话幽默平易近人；他们的师长不拉山头，只搞五湖四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们的师长将有限的粮食分给了兄弟部队，而留给自己和部下的只是满山的野菜。在他们眼里，师长是首长，是朋友，是兄长；他们对师长有爱、有敬，也有怨。逐渐地，我心中有了一个鲜活的传奇人物，我很渴望见到他，像有满肚子话要对他说。第一次进中南海见到他的感觉真好，就像跟自家老伯在一起一样，轻松愉快。说话是那样的单刀直入：

“你叫什么名字？”

“肖春临。春天的春，临时的临。”

“你姥爷还活着？”

“活得比您自在。每天早上练气功，还经常爬山找树根做根雕，平时看看《北京周报》，写写字，想干啥就干点啥。”

“紫阳说你喜欢吃虾，这是从特供商店专门买来的。不吃虾头就留给我的猫吃，不要浪费了。”

李紫阳是他的女儿，她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上学时，李伯伯只让她到我家，不准到任何人家。李紫阳常骑车上街买菜，干什么事都乐意。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晚上，李伯伯又带我去中南海的礼堂看了一场电影。又吃虾又看电影，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后来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我总要去看望李伯伯,特别愿意与他交谈。他爱听我说中南海外边的各种事情,他听着听着就会发表些意见。他讲话时情绪平稳,心境安宁,语言质朴,听到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有一次,我和大哥去北京医院看望李伯伯。事后大哥对我说:“你和李伯伯说话无拘无束,特别说得来,我一听到骂人就紧张。”我说:“我从不紧张,比跟爸爸说话还放松。他骂人,那是在骂那坏人坏事,该骂!”

还有一次,我跟李伯伯说:“报上说中共有 33 位军事家,其中有您的名字。”

“说我是军事家?我应该是经济家。我搞经济,陈云是我的老师。”

又一次,我说:“李伯伯,深圳特区发展很快。很多中央领导都去了,那里的人欢迎您去看看。”李伯伯眼一瞪,大声说:“都去深圳,大西北不要了?大西北的沙漠丢给外国人吗?”说完,他的眼光移向窗外,那坦然的神情没有丝毫的造作,那深沉的目光透着无限的牵挂。我想,也许他牵挂着那些在极差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的老百姓,思念着那些长眠于那片土地下的红军战士。过了一会儿,他又缓缓地对我说:“蛇口最早就是我圈定的,我叮嘱他们这个样板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引进外资,不要将内地的钱吸进去太多,不然国家背包袱。”

一天傍晚看电视时,李伯伯突然对我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我妈妈!”一位 80 岁的老人告诉我他在想母亲,我心中一阵苍凉。红军战士为穷人打天下,背井离乡,留给家乡亲人的是遭受迫害、是艰辛与苦难。而付出最大的莫过于他们的母亲,白发相思铸成了一座丰碑。这每一座丰碑都永远留在了老红军战士的心里,留在了革命的征途上,留在了远去的时空中。

1990 年夏天,我带孩子跟随父母及二哥一家去内蒙。路过北京,我们去中南海看望李伯伯。那天紫阳、小富、李平都在家。大家高高兴兴地交谈着,小孩子嬉闹跑跳特别开心。而李伯伯的脸上一直没有笑容,我静静地坐在他身边。一会儿,他用右手拉着我的手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我死后将我的骨灰撒一把祁连山,撒一把大巴山……”他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比画着。我爸爸插话:“还有大别山。”“大别山,再撒一把大别山,听清楚了?”我们点点头。看着李伯伯和爸爸很轻松说话的样子,好像他们说的不是件很悲伤的事,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现在,李伯伯走了,爸爸走了。我突然明白,应祝福生活幸福,也祝福死亡来临。人自自然然而来,自自然然而去,生也喜,死也乐。还是老百姓看得透,从来就把红白都当成喜事。

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和李伯伯在一起的日子,在飞机上,在中南海,在武昌东湖,

在北京医院。李伯伯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干部子弟要当普通劳动者，要当老实人。你们在沿海工作，不要染黑了，够吃就行。党内不正之风要从中央查起，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对不正之风看不惯，不要退党，而要斗争，要相信组织，要相信大多数。党员要学《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否则，你入党干什么？选人也不能打保票，选错了就要换，政策不好可以改，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一说就准。官僚太坏，自己不干，又不准别人干。干部心里要想着老百姓，要不，你当干部干什么？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为老百姓做一件实事，没有水就解决水，没有电就解决电。你解决了，人民就没意见了。要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些人年轻、聪明、能干，比我们强。我们需要知识型、智慧型的干部，需要为人民办实事的干部。

历史不同，经历不同，看到的也不同。在那敌人重兵围剿的日子里，爸爸妈妈和李伯伯一起度过了生死相依的艰难岁月。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首长。而我看到的是一位心忧天下、海纳百川的共和国主席。从李伯伯身上我感受到的是：身要正，正则可行可止；气要平，平则不卑不亢；智要明，明则能舍能取；心要公，公则利国利民。有了这等修养和水平，什么挫折什么委屈全不在话下，千难万险只等闲矣。他能用自己的觉悟去提升别人的觉悟，能用自己的信心去坚定别人的信心，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凝聚别人的力量，能用自己的成功去造就别人的成功。有这种能力，哪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常想到，李伯伯身上，什么是最吸引我最让我感动的呢？是他那坚定的信念、坦诚的胸怀、挺直的脊梁、刚正的气魄？还是那深沉的眼神、不爱言笑历经沧桑的脸庞，见了儿童却又笑得灿烂慈祥的面孔？好像不是。我从小受到许多革命前辈的关心和爱护，这样的人格魅力，这样的血染风采，早就熟悉。他们身上，奋斗和忘我早已成为习惯，祖国和人民早已融入生命。他们的人生答卷是那样的一致，少年英雄老来豪迈，拥有人民真诚的爱戴。或是他那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一贯作风？好像也不尽然。李伯伯从小胸怀为劳苦大众求天下之大志，在革命的征途上，风风雨雨，忍辱受挫，不惑不怨，因势利导，包容各方，安于进退，顺其自然，终于海纳百川，成就大业。他有着壮丽的篇章，辉煌的世界。然而，一切都在奋斗的必然之中。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哪个不是历经磨难才有了头顶一片天？

抑或是他那简朴的生活？李伯伯家客厅的沙发几十年了，一直不换，破了许多洞，补补照用。卧室简单得只有一张旧木桌子，一把木椅子，一张旧床。床上有张补了好几个洞的旧草席，席子下边是一床到处露着棉花的旧棉絮。东西旧得几乎不能用了，但他坚持要用这些旧物。只有桌子上那台 20 英寸的老电视机还透着现代化的气息。在

中南海居住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毛主席的枕席有九个补丁，周总理的内裤有许多个补丁。五十多年前，毛主席带领干部进京“赶考”入驻中南海，牢记甲申三百年兴亡的教训，强调“我们不做李自成”。历史的考官果然给了高分。开创共和国的领袖们自律性极强，默默过着比普通人还简单的生活。他们的铮铮铁骨和忘我精神与苍穹瀚海同具生命力，他们是共和国永生的一代，与其说我被感动着，不如说我被教育着。为我们党有这样的领导人自豪着，进而对现在的某些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多少次的温馨日子，让我越来越明白：李先念伯伯是辉煌的，他的辉煌因曾是共和国的主席而更加光彩夺目，不同凡响。而我面对的李伯伯，却极普通极平凡。他心忧天下，心系人民。我与李伯伯交谈，不论是谈笑还是争论，都是人品的自然流露。

我喜欢与李伯伯交谈，那是一种难得的经历，一种少有的享受，享受着豁然开朗，享受着心境愉快。虽然他是位高权重的领袖，受人尊敬的长辈，却能平易坦诚对待我这个晚辈，着实让我轻松愉快。所以，最吸引我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与李伯伯的交谈，那是一个普通人与一个普通人之间平等的对话。

若有来生，我还要与李伯伯交谈，在普通人的心境中享受无限愉快，在简单的生活中心享尽人生自由快乐。

(本文作者系肖健章同志的女儿)

父亲带我当红军

◎郑奇英

1925年,23岁的父亲郑位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我们家是革命家庭,祖父郑维翰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在县苏维埃做过财经工作;二叔郑植惠、四叔郑植棣、姑姑郑成香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母亲曹茂云是贫苦农民出身,她爱劳动,地里的活样样都会干。我父亲时常不在家,母亲认为我们这房人对家庭贡献小,因此只要她能干的活都抢先去干。在弟妹面前她是老大,特别尊重老人,关心弟妹的生活,参加妇女组织的活动也很积极。1933年冬,国民党占领我们家乡后,她“跑反”进山,躲藏在山洞里最后冻饿而死;这期间全家有4个人先后牺牲。

我的家乡在苏维埃时期,人民分得田地后生活慢慢好起来,村里的老百姓积极参加农协、妇女协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组织,参加红军的人也很多。我四叔当时是儿童团的大队长,时常带我和他们一起出操、站岗放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家乡后,国民党对根据地红军的家属“斩草除根”,我们家大人都“跑反”或上山打游击。七八岁的我在村里变成无依无靠的人,开始村里的好人留我吃住,到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后,村里人怕我连累他们就不敢留我住了。当时父亲任鄂东道委书记在鄂皖边区活动,后派人来接我。我们白天躲藏在老乡家内或山内,晚上赶路,走了好几天到卡房镇见到我父亲。这是母亲死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我伤心地哭了。父亲亲切地说:“奇英,你别哭,我会把你抚养成人,以后带你当小红军,红军里很多人会教你识字、教你做事。”父亲还对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红军里的人都是受苦人,当官的不打当兵的;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我过去只见过游击队便衣队,听了父亲的一番话后觉得当红军好,红军比游击队便衣队人多,不怕国民党。父亲还教育我要好好学文化,没有文化的人学不到真本事,没有文化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事,国内国外的大事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学校不能安心读书,有文化的人教你认字,一天学几个字,慢慢你就会看书看报了。

不久,父亲送我到红二十八军医院,学当看护员。院长熊德安同志是个坚强的女性,她立场坚定、工作负责、爱护伤员、关心群众,大家都很尊重她。那时我们医院条件

很艰苦，伤员们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在草棚里；医药用品都很匮乏，主要是靠便衣队找关系从敌占区买，绷带和纱布换下来用开水煮过后再用。我每天主要是洗绷带、纱布，学习给伤员换药。看护长戴醒群同志是张体学同志的夫人，每天教我五个字，没有纸就地上写，我边工作边学习，半年后我慢慢会写简单的日记和记流水账了。可惜的是戴醒群同志在抗战时牺牲了。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企图消灭红二十八军，派大批军队来清剿我们，医院被包围，院长熊德安、看护长戴醒群和大部分医生、护士、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敌人把我们押到经扶县（今河南省新县）关起来，在敌人审问我时，我只说我叫李梅英，父母双亡，前几天讨饭到这里，红军把我留下了。每天敌人审问我就是这几句话，当时我心里明白，父亲是红军的“官”，如暴露了国民党不会放过我。事后，别人都说我懂事，骗过了敌人。在敌人的牢中每天只有两顿稀饭，戴醒群左臂负伤不能动，我给她送饭，照顾她。

父亲离开红二十八军后，我一直在红二十八军医院工作。这段时间从院长、医生到护士对我都很好，照顾我生活，向我传授护理知识，教我学习文化，便衣队从敌占区带点什么好东西总是有我一份。熊院长还带我认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做干爹。高敬亭对我说，你父亲不在这里时你就是我的女儿，医院里哪个对你不好我就批评他。高军长对我确实很好，每次见到我都把我抱在怀里，问寒问暖，问我吃饱饭没有，学习文化没有。我对他也很热情，每次看见他都大声地叫他干爹，愿意亲近他，他可高兴啦。我从经扶县出狱后，他还特意把我接到他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心疼我在敌人牢房里吃了很多苦。那时他与史玉清已经结婚，干爹干妈对我都很好，经常带我去他们小灶吃饭，对我疼爱有加。我父亲抗战初期从延安重返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们关系还一直很好。父亲曾多次向高敬亭夫妇表示，感谢他们对自己女儿的关心照顾。我们的关系直到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后才不得不终断。

在鄂豫皖地区，由于高敬亭和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内外新形势认识不清，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思想不通，认为国共合作是向国民党“投降”。党中央派我父亲、程启文、肖望东、张体学等同志来做工作。父亲等人通过形势教育，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逐渐使所有的干部、战士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后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五个团，还有兵站、留守处，驻防在黄安县七里坪一带。不久开赴抗日前线。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肖望东与国民党谈判成功，国民党释放了关押的红二十军

人员,程启文同志接我出狱。但国民党不讲诚意,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还是杀害了我们七八个领导同志,如一位姓张的参谋长,熊德安院长等。出来的同志有的回家了,大部分同志都回到部队,戴醒群和我回部队到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医院继续工作。在七里坪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欣慰地说:你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受了苦,现在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高兴。我告诉父亲我改姓名骗过敌人的事,并说好多认识我的人都没有向敌人告密,如要是有人告密我就不能活着回来。父亲听后拉着我的手夸我聪明,有胆量,并说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保护过你,你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有机会要感谢和报答他们。我点点头说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还关切地问我挨打没有?我说国民党当兵的用枪托打我,我跌倒了,门牙磕到石头上,把两个门牙磕掉了,牙根还发炎流脓,现在好了。父亲心痛地看了我的伤。他告诉我日本侵占了我们中国很多地方,不打日本就要亡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在医院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等以后抗日根据地有学校就送你去读书。

1941年,父亲任新四军二师政委,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所联合中学,父亲才如愿以偿地把我送去读书。中学校长王昭诤是共产党员、大学生。我们班主任刘加林在政治上很关心我,还是我入党的介绍人。学校老师中多数不是党员,他们都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来新四军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我因没有上过小学,学习基础不好,特别是数学有些跟不上,但在政治上我比别人强,下乡宣传抗日我是宣传队长,演出节目我是主角。可惜我在联合中学只读了两年书,1943年秋,父亲调新四军五师,把我带走了。

父亲到五师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对我说,你文化水平有了些进步和提高,但还不够,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另外,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光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还不够,还要有政治理论水平。随后父亲把我送到五师办的党校学习,通过半年多刻苦学习,不仅使我在政治理论上有所提高,在文化上又有新的进步。我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道理懂得多了,工作做得更好了。父亲对我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虽然他工作很忙,每次见到我时都要我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他总是耐心地批评教育我。父亲为了锻炼我,又叫我随部队到农村工作了半年。

1945年初,组织上分配我到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我们主要是负责五师与新四军总部的机要通讯联系工作。同年10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父亲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他的工作更忙了,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围攻中原部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父亲和先念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原部队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克服各种困

难,突破敌军重重包围,转战千里,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部署的战略转移任务。

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在父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在熊德安院长,戴醒群看护长,高敬亭干爹和很多叔叔阿姨及同志们的关心、帮助、照顾、爱护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能为革命事业、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都要万分感激我的父亲带我当红军。

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七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父亲对人民忠心耿耿,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历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民所铭记。

我永远深深地怀念敬爱的父亲。

我的父亲郑位三

◎郑复康

父亲郑位三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在人生的纬度中已不短暂，但他的容貌仍在我们眼前；他的声音仍在我们耳边；他的深邃独立的思想、高尚的情操、磊落的品德更是铭记在我们的心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同志、老战友，也都在不断地追忆他，褒扬他，怀念他。

父亲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1902年生于湖北红安；从7岁开始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郑锡云是个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常向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看法。父亲从小聪明好学，肯动脑筋，爱想问题，对老师讲的课，听得认真，记得清楚，常提出一些连老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老师非常喜欢他，有时因为下雨或放学晚，就住老师家。父亲原名叫郑植槐，16岁时他去武昌以名列第三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郑锡云老师就给他改名为“位三”，并写信给肖楚女请他照顾父亲。

在武昌读书的父亲，在肖楚女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在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父亲积极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列。随后，恽代英等又组织了“利群书社”，利群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利群书社既是经销各种新书报的书店，也是当时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还是武汉地区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和对外交往的联络点。它不仅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有业务往来，而且和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进步社团有密切联系。父亲通过肖楚女和利群书社成员郑南宣等人的介绍，与利群书社取得了联系。在利群书社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从一般的对现实不满到产生了要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他当时经常对别人讲：“参加利群书社的活动，使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落后是由中国反动政府勾结洋人对中国人民实行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要改变我国落后状况，也应像俄国一样，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府，赶走洋人，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他还开始意识到发动农民的重要性，他

说：“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发动农民，改造社会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后，他本可进入武昌高等师范继续读书，但他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动腐朽，他立志走革命道路，毅然回乡，利用教书的条件，宣传马列主义并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胜利地攻占了武汉，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父亲以国民党黄安县委常委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同时又是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农民协会的常务委员，这时他已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此同时他与吴焕先利用“红枪会”的形式组织训练农民的革命武装。后来这支党领导的武装成为农民自卫军，是著名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有人脱党退党，他却把四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黄安县委并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随后他步行到武汉，找到省委书记罗亦农同志。他带着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迅速返回黄安，9月他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父亲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担任县委书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等职。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父亲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第二届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苏区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父亲在危难之中，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职务，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他面对混乱的局面，首先抓了稳定群众情绪的工作。父亲指示道委向各县、区、乡发出通知，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党和政权组织；动员各级干部深入群众，做细致工作；组织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坚决同敌人斗争，很快使局面有了好转。与此同时，他抓紧建立地方武装和支援主力红军作战。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或独立师，总计五千余人。为重建红二十五军，父亲表示，红二十五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鄂东北的游击武装成批补充到主力红军中。他多次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主张以游击战为主，坚决反对在我军内部和群众中再搞“肃反”，使我军减少了损失；他把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对敌人工作结合在一起，首先提出了不要镇压敌占区被迫“插白旗”的群众，通过广泛的宣传，争取了大批群众；他在斗争中，还总结出了便衣队的斗争形式，创造了利用便衣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的时期。父亲领导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